

■ 教育数字化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3.02.005



# 数字劳动教育：革新、风险与实践

王豪杰, 李 怡

(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州 510641)

**摘 要:**伴随教育数字化的转型发展,人们的学习生活、生产劳动和交流方式都发生了变革式重组。数字技术与劳动教育的深度融合,带来数字劳动教育的出场。研究发现,数字劳动教育最显著的革新表现为 3 个方面:一是数字劳动教育内容的创新,培育劳动者的数字素养成为核心内容;二是数字劳动教育途径的拓新,打破了教育世界与生活世界的隔阂,实现“生活即教育”的育人目标;三是数字劳动教育方式的更新,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数字劳动教育实现了跨空间的无限衔接性和跨时间的即时时序性,改变了以往言传身教的教学方式。同时,数字劳动教育还需预防和规避教育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其一,要防备唯技术主义倾向;其二,要防止出现忽略数字劳动之外的各种实操性劳动,从而弱化人的体能劳动教育的风险;其三,要预防因数字运作逻辑而产生的对社会效益冲击的风险,如算法规则窄化劳动交互场域,数字鸿沟带来数字劳动教育不公的风险。基于对数字劳动教育潜在风险的分析,未来数字劳动教育的发展在跟进技术发展的同时,要重视对劳动价值观念和劳动品质的培养,实现数字劳动全员育人的目标。明确数字劳动教育实践的阶段性要求,构建数字劳动教育评价机制,实现全过程育人的目标。借助一体化的数字劳动教育平台,统筹协调社会各方力量,形成数字劳动教育全方位育人的社会合力,实现数字劳动教育的守正创新。

**关键词:**数字劳动教育;劳动育人;教育数字化;数字素养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3)02004309

## 一、问题提出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

修回日期:20220820

作者简介:王豪杰,山西临汾人,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劳动与文化研究。

通信作者:李怡,湖北安陆人,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引用格式:王豪杰,李怡. 数字劳动教育:革新、风险与实践[J]. 重庆高教研究,2023,11(2):4351.

Citation format:WANG Haojie, LI Yi.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innovations, risks and practices[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2023,11(2):4351.

要载体的新经济形态,重塑着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数字劳动作为数字经济中最新的劳动形式,不仅承载着全要素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动力,也带来数字劳动教育的时代出场,推动教育内容、教育时空、教育方式的变革升级。就数字劳动教育内容而言,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数字素养培育和行业相关经验的学习应当是数字劳动教育的主要内容<sup>[1]</sup>。特别是对于大学生来说,提升数字素养可以提高他们对未来雇主的价值,并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吸引力<sup>[2]</sup>。此外,有学者认为数字劳动教育的任务是培育“激进的数字公民”,使其对数字、技术和公民身份有政治知情的理解,让劳动者与技术的社会关系变得可见,并发展社会正义的解放性技术实践<sup>[3]</sup>。就数字劳动教育过程而言,Rasskazova 认为,传统的劳动教育体系已经严重过时,数字劳动教育将以现代数字技术为基础,教育过程将通过使用全球教育平台来实施,为学生提供全球互动的机会以及先进的知识和经验<sup>[4]</sup>。福克斯认为,由复杂的软件和人工智能(AI)实现横跨设备、台式机 and Web 平台的虚拟社会——物理融合(VSP),使自动化工程同人的想象力完美融合。对人的想象力培育及自动化教学将成为未来数字劳动教育的重要特征<sup>[5]</sup>。就数字劳动教育治理而言,巴拉巴诺娃从数字技术带来的风险来考察数字劳动教育的治理。她认为,在数字环境下,青年需求的变化速度比教育项目快,劳动力自动化导致裁员,数字自闭症、专业社会、智力技能的下降以及数字成瘾等风险,都是数字劳动教育需要直面的问题<sup>[6]</sup>。

国内学者关于数字劳动教育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肖绍明首次提出数字劳动教育这一概念,并从集体性、交互性、人文性、主体性和公平性 5 个角度阐述其内在特性<sup>[7]</sup>。许书敏等人则从数字劳动带来劳动形式、劳动者角色的变化出发,认为数字劳动教育要突破传统劳动教育模式,“逐渐从物质性的、技术性的功利需求延伸到人的主体性、精神成长、劳动素养等方面”<sup>[8]</sup>。王毅等人认为,伴随人工智能嵌入劳动教育的程度愈发加深,劳动教育应当重视学生劳动情感、劳动思维、劳动方式及劳动价值观的培育<sup>[9]</sup>。

通过对学界既有研究的梳理和排查,国外相关研究多以市场为中心,认为数字劳动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劳动力的价值提升,偏向竞争性价值取向,对于劳动立身育人的意义涉及较少。国内相关研究虽然关注到数字劳动教育在情感、价值、协同等深层次的育人价值,但囿于研究起步较晚,对于数字劳动教育是什么、较之以往有何革新之处、其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以及在实施数字劳动教育过程中如何预防和规避这些风险等议题上都有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数字劳动教育本质上是数字信息大潮中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部分,是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劳动育人、技术强人为目标的劳动教育新样态。其重点在于培育学生数字环境下科学使用通信技术,对各类媒体信息(文本、图像和声音)进行高效检索、识别、整合、互动和再创造的意识、心态和能力,帮助学生在思想层面认识数字环境下劳动的公共性,树立诚信、积极的劳动意识和劳动品质。在实践层面,数字劳动教育引导学生在道德地、智慧地、轻松地使用日常信息工具,以动手实践为前提,参与相关的数字行业项目,获得有价值意义的数字劳动体验。在社会层面,数字劳动教育教会学生以数字化交流方式进行情感互动,辨识虚拟世界中的人和信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数字社会,体会数字经济下的分工合作。当然,数字劳动教育也可能出现过度推崇数字化而忽视劳动教育内在特性的潜在风险,需要立足数字劳动教育目标,推进数字技术与劳动教育的深度融合,实现数字时代劳动教育的守正创新。

## 二、数字劳动教育的时代革新

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尼古拉斯·汉斯(Nicholas Hans)认为,对事实的无价值判断要通过因素分析来掌握教育发展的一般法则<sup>[10]</sup>。因素分析法并非简单的罗列,而在于探究教育发展的最突出特征,发掘教育“变化的自我决定因素(self-determinators for change)”<sup>[11]</sup>。教育的三因素包含教育者、学习者和教育过程,其中教育过程的数字化革新是数字劳动教育最突出的特征,即教育内容的创新、教

育途径的拓新和教育方式的更新<sup>[12]</sup>。

**(一)数字劳动教育内容的创新**

教育同人类社会的生产劳动息息相关。数字劳动教育内容的创新源于对“数字劳动”这一劳动新形态的积极回应。国内外学者纷纷从传播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视角对“数字劳动”这一概念进行阐释。他们认为数字劳动包括“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sup>[13]</sup>、“互联网产销一体化劳动”(prosumer)<sup>[14]</sup>、“玩劳动”(free labor)<sup>[15]</sup>、“受众劳动”(audience labor)<sup>[16]</sup>以及“平台劳动”(platform labor)<sup>[17]</sup>。广义上的数字劳动是指“数字媒体技术生产和内容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活动”,狭义上的数字劳动是指“网络用户在数字平台上进行的、为互联网公司带来利润的无偿活动”<sup>[18]</sup>。概言之,数字劳动就是以数据为劳动对象,以数字化劳动产品为结果的新型劳动。

一方面,这种劳动新形态使“体力劳动的感受性”降低,信息加工和再创造成为主要内容。农业时代,农耕劳作具有简单性、劳力性、一次性的特征;工业时代,大工业机器生产呈现出标准化、专业化、机械化的特征;数字时代,数字化生产出现智能化、个性化、可编辑化的新特征。一旦事物被数字化,就会摆脱形式上的束缚,其量的价值大大降低,但质的价值飞速增长,如“价值、资本和数字代码可以通过机械和计算的形式被虚拟地成倍增加”<sup>[19]</sup>。特别是在数字经济中,原创性的信息模组是开启数字新世界的锁匙,蕴含极大的社会经济价值。因此,让学生熟练掌握数字工具,培育其信息创新能力成为数字劳动教育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需要挖掘学生的数字潜能,增强其通过数字化媒介进行合作交流的能力。在数字时代,“数字劳动让教育和知识的创造及其获取、认证和使用成为所有人的事,成为社会集体努力的一部分”<sup>[20]</sup>。就数字劳动对象而言,数据的出现源自每一个人的搜索、点击、分享、上传、下载等自发劳动。就数字劳动的过程而言,无论是网页平台的维护、数字产品的使用反馈,还是前端设计和后端的开发,都更加注重用户的交互体验。就数字劳动的成果而言,其可复制性、可编辑性的特征,让数字产品的延展性和适用性更广。因此,数字劳动教育不仅要让学生熟悉对数字信息的筛选、数字工具的使用,同时也要强化对数字产品的评估和数字成员间合作的能力。

**(二)数字劳动教育途径的拓新**

依托数字技术的开放性、智能性和便捷性,数字劳动教育的时空范围不断拓新。

其一,数字劳动教育打通了教育世界与生活世界的“隔阂”,实现“生活即教育”的育人目标。以往的劳动教育因教学场所固定、课堂时长有限、教育资源不足等因素制约,劳动教育过程时常出现中断。例如,出现在学校劳动而回家不劳动的不合理现象,劳动教学的系统性、过程性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随着数字技术的应用,劳动教育内容逐渐被数字化和趣味化,学生的自制vlog、编程设计、多媒体展示,都是对数字劳动这一劳动新形态的践行。同时,数字技术将劳动教学的场景从校内搬到校外、从现实搬进网络,让学生、老师和家长以参与者、监督者、发布者等多重身份实时参与到数字劳动教育的各个环节之中,在增强教育内容互动的同时,也强化了教育的过程性和监督性,形成教学相长、学做结合、学校与家庭互补的数字教育生态。

其二,数字劳动教育重构着教育的主客体关系。一方面,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性。借助数字工具,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查看并学习劳动教育的相关知识。成长于数字环境下的青年一代对于数字技术有天然的依赖和好感,约有“70%的学生认为,劳动技术就是信息技术”<sup>[21]</sup>。当学生通过数字化劳动将认识世界同现实世界相统一时,也会强化对劳动的认同和自觉,是对劳动“力行”观念的一种潜移默化的“灌输”。另一方面,数字劳动作为一种劳动新形态,许多家长还不甚了解,学生对于劳动的价值意义也未真正领会。因而,数字劳动教育既改变家长对数字劳动这一新形态的“保守”观念,同时也传承长辈们真挚的劳动情感和宝贵的劳动品质,是双向融合、双向教育的过程。

**(三)数字劳动教育方式的更新**

数字劳动教育是面向数字时代未来,培育适应、引领数字经济人才的教育活动。因此,要注重围



绕数字劳动教育的目标要求,从提高育人效果出发,选择适宜的数字劳动教育方式。

其一,创设数字劳动情境,启发学生自主思考。信息技术的应用,使得数字劳动教育实现了跨空间的无限衔接和跨时间的即时时序,改变了以往言传身教的教学方式。一方面,通过创设数字项目实践,让学生在数字生活情境中培养自立自强的意识,建构正确的数字劳动习惯;在数字生产情境中体验劳动形态的变迁,感受劳动创造的魅力,认识平凡劳动的伟大;在数字服务情境中强化社会责任感,领会数字劳动带给他人的快乐,体悟劳动之美。另一方面,数据库和信息流给予受教育者更多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但也存在“唯数据”的偏颇和过度依赖技术的风险。因此,需要通过创设数字劳动情景,让学生提前认识到这些负面影响,强化对数字价值观的培育。诸如数字安全意识、数字专利和版权意识、数字法律意识、数字公德和服务意识以及个人的数字品位等。

其二,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构建数字劳动全方位育人体系。首先,数字劳动教育的存在感更强。直播、聊天、点赞、转发,甚至是 DIY 等数字劳动,本身就是学生群体的日常生活表现,同时也让数字劳动教育不再是游离于学生生活之外的死板教条的内容,反而扩大了学生们的日常生活,丰富了数字劳动教育形式。其次,网络资源的隐性教育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动力。特别是网络文化社群的活跃,激励着学生自主学习相关的数字技术及前沿知识,加深对数字劳动文化的认知。最后,结合课堂显性教育和网络资源的隐性教育,数字劳动教育可以在师生之间建立和谐互动的良性关系,老师更加尊重学生的个性化表达和创新想法,学生在数字劳动教育中也有更多参与和表达的机会。

### 三、数字劳动教育面临的潜在风险

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一书中提到:“我们生活里的所有社会组织器官、交往和娱乐生活都被数字化技术的先天综合所重新塑形。”<sup>[22]</sup>数字技术在为劳动教育赋能的同时,也存在过度追逐数字化教学而忽视数字劳动教育内在思想性、实践性、社会性的风险。

#### (一)数字劳动教育思想性的风险

数字劳动教育的思想性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指导下,引导学生自主参与劳动,培育学生创新性思维方式和服务性的劳动价值观,反对不劳而获、拜金享乐的错误观念。但是,数字化在为劳动教育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唯技术主义倾向和偏离劳动价值观的风险。

其一,在数字劳动教育的过程中,数字工具既能为学生提供更为自由的学习环境,也极易导致学生的技术成瘾性倾向,陷入“技术万能”的唯科学主义 (scientism)。例如“作业帮”等答题软件,通过“拍照—上传—解析—答案”的简单步骤,就可以让学生轻松完成学习任务。借助数字工具完成劳动任务,不仅容易滋生劳动惰性,而且也窄化了劳动场域,让人的劳动范围仅限于数字世界。一旦脱离数字工具承载的劳动空间,人就表现出无所适从的状态,“虚拟和真实之间的失切性导致学习者产生认知偏差”<sup>[23]</sup>。托尼·多考皮尔也认为,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互联网移动化和社交化让人们变得迟钝、孤独,甚至表现为焦虑和抑郁,直至不可避免地成为“网虫”<sup>[24]</sup>。技术工具代替了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的延伸,导致劳动个体意义的迷失,失去劳动的主动性。数字劳动教育呈现出的海量资源则使学生无从下手,因而智能推荐、碎片化学习方式让学生更习惯于被动接受,从而丧失对系统知识的主动学习。

其二,数字经济中存在的错误劳动价值观冲击着数字劳动教育的思想性目标。随着流量经济的强势崛起,财富增长的曲线不再被劳动周期的指数所影响,传统“劳动—致富”的绝对关系被遮蔽。真实的需要被眼花缭乱的算法推荐给带偏,创造价值的劳动身影也被时髦的“眼球经济”所取代。劳动的过程和方式不再受人关注,能否获利反而喧宾夺主成为唯一标准。加之流量明星天价片酬、直播带货数亿销量等媒体宣传,踏实肯干的劳动观念也受到冲击,赚“快钱”、“一夜暴富”的心理作祟,追

求周期短、见效快、回报大的“急躁心理”成为数字经济下劳动价值观的一个缩影。这些现实情况给数字劳动教育的思想性目标带来极大的挑战。

(二)数字劳动教育实践性的风险

数字劳动教育的实践性是指立足现实生活世界,以动手实践为前提,通过数字劳动感悟生命意义,实现强体、增智、树德、育美的目标。但数字劳动容易忽略数字劳动之外的各种实操,带来弱化人的体能劳动教育的风险。

其一,在生命意义层面,劳动是人存在的前提,不是劳动需要人,而是人需要劳动。劳动是人与自然互动、交流的过程,是感受生命成长的关键环节。“生命自觉”是数字劳动教育实践性的前提,教导学生自立自觉是其首要内容。所谓自立自觉就是认识到劳动创造人本身,“生命的自觉”来自劳动的自觉,主体的自立来自劳动的独立。劳动的数字化样态虽然改变了身体在场的方式,隐蔽了劳动体力性感受,但并不意味着劳动者自身极限的不存在。如今仍然存在的“电子病”“过劳死”等现象说明劳动的生产在场仍旧损耗着人的身心。数字劳动教育不能被劳动的“数字化”遮蔽劳动的“生命性”存在,要牢牢把握劳动主体而非技术主体的教育目标。同时,劳动的“虚拟在场”容易带来人对自然认知的钝化,导致虚拟空间的臆想和现实空间的客观出现错位,引发潜在的数字生态危机,这也给数字劳动教育的实践提出警醒。

其二,在实践意义层面,通过劳动“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经过更长的时间引起的骨骼的特殊发育”<sup>[25]</sup>,进而实现人的体质与大脑的进化,人类的历史得以发展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立场。但随着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元宇宙(metaverse)等沉浸式数字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全过程数字化趋向,劳动者的“身体空间”被遮蔽,致使人的主观认知世界同客观存在世界相脱节,劳动的实践目标出现了偏差。一方面,数字劳动的开展必然伴随数字工具的应用,人的劳动行为被简化为敲打键盘、点击鼠标、触碰屏幕等,对数字工具的过度依赖会带来思维上的钝化,劳动强体、增智的实践意义被弱化;另一方面,光怪陆离的直播内容,眼球经济下的审丑猎奇,偏离了劳动育美的初衷,网络水军恶意蹭热点、玩梗、控评、删帖等行为,不仅本身不道德,更引起了对社会舆论层面、意识形态价值层面的误导,产生劳动道德的失范。因而,数字劳动样态下复杂的实践内容,带来了数字劳动教育实践目标偏离的风险。

(三)数字劳动教育社会性的风险

数字劳动教育社会性是指强化学校教育同社会生产、生活之间的衔接,让学生有更丰富的劳动体验。但随着数字技术同劳动教育的深度融合,数字劳动教育可能存在技术“算法”控制劳动教育过程、数字鸿沟加剧劳动教育不公的社会性风险。

一方面,算法技术普遍应用于数字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可能存在算法逻辑宰制,窄化教育空间和劳动参与的场域。算法(algorithm)是指对一系列问题给出精准而完整的解决方案或规则的机器指令。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西奥多·罗斯扎克认为,信息被赋予无所不能、包罗万象的定义。数字算法因其高速精确的信息处理能力而备受数字劳动者推崇。因无法理解算法背后的具体逻辑,数字劳动者只需要听从算法指令进行操作,其他问题就一定能够迎刃而解。这种劳动思维习惯形塑了一种单向度的技术性劳动教学,使得数字劳动教育在培养创新型人才、辩证思维能力的过程中遭到很大的阻力。同时,算法为数字劳动教育推送的劳动知识、技能具有同质性,控制着数字劳动教育的全过程。在面对浩如烟海的教育资源时,数字算法可以根据受教育者的不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提供数字劳动教育资料的精确筛选和实时推送,同时收集每位学生的数字劳动“留痕”,通过创设模型为每位学生量身定制教学计划、奖惩机制,为数字劳动教育的效果预设算法规则。这导致数字劳动教育的人文价值被锁在算法规则之内,劳动的自主性受到限制。学生群体极易陷入“信息悖论”陷阱,受制于算法的

“信息茧房”,劳动认同难以聚合,学生的信息隐私也被全程监控,增加了数字劳动教育的伦理风险。

另一方面,数字鸿沟不单单是一个技术层面的算法问题,更是关乎数字劳动教育公平与否的社会问题。数字鸿沟本质是对信息占有程度不平等而造成的数字差距,产生数字劳动参与以及接受数字劳动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虽然人人都可以借助数字平台进行劳动,但是这并不等于人人都有能力、有经济和技术条件来自主选择劳动。同样的,虽然数字劳动教育的信息化为每一个地区的每一位受教育者带来学习的可能,但数字劳动教育的师资力量、实践基础、数字化程度在城乡之间存在差异,使得学生在接受数字劳动教育的起点和实践中拉开了差距,这种数字劳动鸿沟在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地区之间明显存在。就教育同社会生产实践相结合这一环节而言,教育数字化转型可能存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潜在风险。

因此,数字劳动教育需要打破“算法权威”,使劳动者在“自我”中沉思存在的价值,在“他者”中丈量社会的责任,在“现实”中确定奋斗的坐标。随着承载乡土文化的农业经济和钢铁意志的工业经济转向承载多元文化的数字经济,教育的情境更偏向数字生活,教育的人文性和技术性衔接更为紧密,“数字劳动的物性、人性、活动性和可认知性”<sup>[7]</sup>也逐渐成为数字劳动教育的一部分。同时,借助教育数字化转型,高质量的教育资源要跨越数字鸿沟,补足地域差异,实现数字劳动教育的全覆盖。

## 四、数字劳动教育的实践图景

基于对数字劳动教育潜在风险的分析,面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趋势,未来数字劳动教育的发展需要在跟进技术发展的同时,关注教育主体的思想性建设。针对数字劳动教育实践性不足,要尽快完善数字劳动教育的层级结构,形成全过程育人体系。强化数字劳动教育的社会性目标,凝聚社会合力,扩大数字劳动教育的影响力和覆盖面,实现数字劳动教育的守正创新。

### (一)强化数字劳动教育的思想性建设

劳动离不开人,数字劳动教育的思想性意指劳动者不仅要掌握扎实的数字劳动技能,还需要具备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念和优良的劳动品质,实现数字劳动主体的“身心统一”。

其一,掌握扎实的数字劳动技能。在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对知识的创新、技能的掌握都有更高的标准。因此,需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在动手、动脑过程中系统、完整地掌握与数字相关的知识技术,在具体的数字劳动过程中磨炼自己的工匠精神,不断提升个人的劳动审美、劳动创造和劳动道德。只有通过亲自动手实践,学生掌握的劳动知识和技能才会更加扎实、熟练<sup>[26]</sup>。

其二,培养积极的数字劳动观念。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劳动力市场的形式,还将劳动从工厂引至互联网平台。技术的强大带来劳动能力的“膨胀”,使劳动者极易在数字工具的强大中迷失自我,因此,必须树立积极健康的数字劳动观念。无论劳动工具如何强大,也无法替代劳动者本身,劳动是人的神圣性、尊严性的外在表现。数字算法虽然具有强大的智能性和自动化能力,但它无法完全取代人。寄生于数字算法之下的劳动只是“纯粹动物状态”的现代复活,只有合理利用数字工具进行创造性、社会性劳动才是“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

其三,秉持良好的数字劳动品质。要引导学生在数字时代尊重不同劳动职业,乐于参与劳动,开展劳动创造。数字技术在给人类的劳动生产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给社会稳定和知识安全带来挑战。因此,一方面,学生作为未来数字劳动大军要遵守数字劳动相关法律法规,杜绝数字霸凌和技术犯罪,培养诚实劳动的品质;另一方面,学校要积极引导学生面向数字世界的美好方向,领略数字算法的魅力,灵活运用数字工具服务社会,实现自身价值。通过数字劳动教育把握劳动创造财富、创造美好生活的价值取向。

### (二)完善数字劳动教育的层级结构

数字劳动教育的实践性风险表明,数字劳动教育过程中会出现碎片化、功利化和形式化等问题。



因此,必须明确数字劳动教育实践的阶段性要求,构建数字劳动教育评价体系,进而完善数字劳动教育的层级结构,实现全过程育人的实践目标。

一方面,完善数字劳动教育实践的阶段性要求。劳动首先要通过身体感受,以体力劳动为基石,改善肌体素质,打造强壮的身体基础,进而使学生掌握日常生活的自理能力,培养勤俭自立的良好生活习惯。其次是对学生创新性思维的训练,使其更契合数字时代的发展需要。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技术等新兴样态的劳动面孔,都要求劳动的原创性、联动性和多样性。因此,创新性人才的培养是数字劳动教育的核心目标。最后,无论是从实践还是思维上的培养都离不开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劳动的初心和劳动产品性质既不是由劳动者身体素质决定的,也并非创意想法所左右的,而是直接反映出劳动者的价值观念。因此,要将数字劳动教育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健体、以劳塑美价值理念在当下仍具有现实解释力。只有在劳动中诚信、劳动中爱国、劳动中友善、劳动中敬业,劳动才具有人格意义,数字劳动才不至于被技术所异化。

另一方面,构建数字劳动教育评价体系。教育不能只教不问,教育评价是对教育成效的重要检验环节。数字劳动教育不仅要避免程序化、同质化倾向,同时也要善于结合具体地区和学生群体特点,体现教育特色。首先,注重结果评价与增值评价相结合。创新性是衡量数字劳动教育成效的第一标准。学生掌握劳动创新的能力是否合格,以及其在劳动成果、劳动方式创新的进步程度如何,都是评价数字劳动教育实践效果的标准。其次,自我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综合学生自评、班级互评、专家评价的结果,科学评判数字劳动教育实践过程中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努力程度。最后,综合评价与特色评价相结合,注重教育过程中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数字劳动教育除了要达到强体、增智、树德、育美的整体标准之外,还需要关注不同地区、不同学生的教育环境、教育资源的差别,需要结合具体环境进行评估,确保评价的真实、全面。

### (三)凝聚数字劳动教育的社会合力

劳动教育同社会生产实践相结合是数字劳动教育的重要原则。借助一体化的数字劳动教育平台,统筹协调社会各方力量,形成数字劳动教育全方位育人的社会目标。

首先,优化数字劳动教育平台,实现资源共享。在学习过程中,开放式的教育平台不仅能共享课程资源,同时还能实时参与到他人创建的数字项目中,自主组建兴趣小组,形成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学习环境。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样本数据进行模型分析,对于学生在劳动认知和技术上的错误能够即时指正,让数字劳动教育更有针对性。同时,优化数字劳动教育平台,打通地区数据孤岛,加强地区间数字劳动教育经验的交流分享,杜绝有教无劳、有劳无教的问题出现。全力推进数字劳动学术研究,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建设。

其次,在全社会形成道义化的数字契约精神。数字劳动的开放性、自由性以及数字劳动产品的可编辑特征,使得数字产品极易被盗用和破解。因此,要培养年轻的数字劳动者具备“数字劳动道义”。所谓“数字劳动道义”,一是要有数字契约精神,不随意破解、贩卖他人的数字劳动成果;二是要有数字服务精神,充分发挥自身能力服务于知识共享,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生态空间。网络平台和数字工作的意见领袖要有自觉的社会担当。两者在获益于互联网的同时,要积极反馈社会,推动数字劳动的正向价值引导,以自身作为数字劳动榜样,从观念、心态、产品三方面引导青年数字劳动者树立辛勤劳动、诚信劳动和创新劳动的价值观念。

最后,筑牢数字劳动的制度底线,延展数字劳动教育的社会效应。一是要改变数字劳动泛娱乐化、商业化功能的状态,筑牢数字技术造福于人的价值观念。二是破除“数字技术主义”的迷思,加快数字技术的基础建设,提高数字技术在三大产业的应用,增强“固移融合、宽窄结合”的数字联合能力。三是增强数字劳动治理能力,形成数字服务政府、数字平台企业、数字劳动群体多元协同的数字

治理格局。明确数字平台的责任和义务,打破数字垄断和防止数字资本的野蛮生长,保障数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四是强化数字劳动安全体系,防范各类数字风险。数字劳动不仅是个人劳动,更是构成整个数字经济的基础。要加强数字经济立法、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网络云平台审查和安全评估等,形成一种可视化的制度保障。

中国面临数字经济的转型升级,对数字劳动者的需要日益扩大,数字劳动教育的重要性、紧迫性也愈发凸显。数字劳动教育要让学生在技术中享受劳动,在劳动中拥抱技术,实现技术强人与劳动育人的统一。因此,数字劳动教育是国家发展、人才培养、价值塑形的关键环节。提高数字劳动的技术素养,保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劳动精神,是数字劳动教育的时代主题。

参考文献:

[1] MEANS A J. Platform learning and on-demand labor: sociotechnical projections on the future of education and work [J]. Learning media & technology, 2018, 43(3): 326-338.

[2] BEJAKOVIC P, MRNJAVAC E. The importance of digital literacy on the labour market [J]. Employee rel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20, 42(4): 924-932.

[3] EMEJULU A, MCGREGOR C. Towards a radical digital citizenship in digital education [J]. Critical studies in education, 2019, 60(1): 134-147.

[4] RASSKAZOVA O, ALEXANDROV I. Key competencies in the digital age and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J]. IOP conference series: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20, 940(1): 49.

[5] FOX S. Mass imagineering: combining human imagination and automated engineering from early education to digital afterlife [J].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17(51): 163-171.

[6] BALABANOVA A, PETROVA S, FOMENKO V, et al. Labor potential of you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J]. E3S web of conferences, 2021(258): 47.

[7] 肖绍明. 数字劳动教育与治理 [J]. 中国德育, 2019(2): 30-35.

[8] 许书敏, 杨广立. 数字劳动主导下的劳动教育简说 [J]. 中国德育, 2019(2): 40-43.

[9] 王毅, 王玉飞, 吴嘉佳.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 内涵、价值与实现路径 [J]. 当代教育论坛, 2021(2): 97-106.

[10] 赵明玉. 比较教育中的“历史—因素分析法”: 解读汉斯的《比较教育: 教育的因素和传统研究》[J]. 外国教育研究, 2007(8): 121-126.

[11] 顾明远, 薛理银. 比较教育导论: 教育与国家发展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6: 111.

[12] 教育部关于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 [EB/OL]. (20200707) [2022052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jc\\_jcjcgh/202007/t20200715\\_472808.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jc_jcjcgh/202007/t20200715_472808.html).

[13] 迈克尔·哈特, 安东尼奥·奈格里. 大同世界 [M]. 王行坤,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05.

[14]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 [M]. 周延云,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3.

[15] TERRANOVA T.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J]. Social text, 2000, 18(2): 33-58.

[16] FUCHS C, SEVIGNANI S. What is digital labour? What is digital work? What's their difference? and why do these questions matter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J]. Triple 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2013, 11(2): 237-293.

[17] 姚建华. 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M]. 江苏: 人民出版社, 2021: 3.

[18] 刘雨婷, 文军. “数字”作为“劳动”的前缀: 数字劳动研究的理论困境 [J]. 理论与改革, 2022(1): 117-131.

[19]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 文森特·莫斯科. 马克思归来 [M]. “传播驿站”工作坊,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910.

[2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反思教育: 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 [M].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7: 3.

[21] 凌宗伟. 谈劳动教育的前提是如何理解“劳动” [N]. 中国教师报, 20190626(03).

[22] 张一兵. 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构境论解读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18.

[23] 沈阳, 逯行, 曾海军. 虚拟现实: 教育技术发展的新篇章——访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沁平教授 [J]. 电化教育研究, 2020, 41(1): 59.



[24] 吴万伟,迈克尔·曼森. 痴迷于互联网的媒体[J]. 青年记者,2013(4):74-72.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61.  
[26] 徐海娇. 重构劳动教育的价值空间[J]. 中国教育学刊,2019(6):54-56.

(编辑:杨慷慨 校对:吴朝平)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Innovations, Risks and Practices

WANG Haojie, LI Yi

(School of Marxism,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641, China)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transformational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ducation, people’s learning life, productive labor and communication methods have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ve restructur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labor education brings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most significant innovation of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is manifest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innovation of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content, and the cultivation of workers’ digital literacy becomes the core content. Secondly, the innovation of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approaches has broken the gap between the world of education and the world of life, and realized the goal of “life as educ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enabled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to achieve infinite connectivity across space and instant timing across time, which has changed the previous teaching method of teaching by example. At the same time,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also needs to prevent and avoid the potential risks brought b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First,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should be ideologically guarded against technocratic tendencies. Seco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should prevent the risk of neglecting various kinds of practical labor beyond digital labor and thus weakening human physical labor education in terms of practicality. Third,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should prevent the risk of impact on social benefits arising from the logic of digital operation, such as the risk of narrowing the field of labor interaction by algorithmic rules and the risk of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injustice brought by the digital divid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otential risks of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labor values and labor qualities while following up th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realize the ideological goal of digital labor whole-person education. The stage requirements of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practice are established,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to be constructed, and the practical goal of whole process education to be realized. With the help of the integrated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platform, all social forces are coordinated to form the social goal of all-round nurturing of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and realize the innovation of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Key words:** digital labor education; labor education; education digitalization; digital literacy